

統一與分裂

中國歷史的啟示

葛劍雄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自序

雖然我從小就喜好歷史，但那只是少年時代盲目好奇心的表現。直到 1978 年 10 月考取為復旦大學的研究生，三年後又留校工作，才確定了以歷史地理研究為終身職業。剛讀研究生時，還不知歷史地理為何物，就像外界不少人以為就是歷史加地理這兩門學科。幸而先師季龍（譚其驤）先生抱病設帳，在華東醫院大廳一角為我們五位同學講了第一課，才明白歷史地理的學科屬性，與歷史學、地理學的關係，不禁心中竊喜，原來歪打正着，所選專業正適合自己的需要，符合自己的興趣，也能利用自己儘管不多卻也不無價值的積累。更出乎意料的是，一年後領導明確我擔任先師的助手，從此有更多的機會接受先師的耳提面命，瞻仰史學界泰斗和前輩的風采，聆聽他們的教誨。

一開始我選定的研究方向是西漢人口，1979 年寫了一篇《西漢人口考》，發表於《中國史研究》，以後用作碩士學位論文。1983 年以此為基礎寫成博士論文《西漢人口地理》，1986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後又承擔《中國人口》項目的子課題，完成中國人口歷史變遷的概述，直到完成《中國移民史》和《中國人口史》，前後花了二十多年時間。不過我最關注的還是更大的時間和空間內的發展變化，其中之一就是中國歷史上的統一和分裂。幼時讀《三國演義》，對「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印象深刻。以後自學歷史，了解了歷朝歷代的興衰，似乎證實了這種分合的規律。而歷史學界長期肯定的規律卻是，統一

是中國歷史的主流，分裂是支流；統一的時間越來越長，分裂的時期越來越短；統一的範圍越來越廣，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不過，聯繫到具體問題後，就發現沒有那麼簡單。特別是在協助先師修訂《中國歷史地圖集》時，對歷史時期疆域的變遷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糾正了長期沿襲的誤解。例如，以往無不將公元 960 年北宋建立當作大分裂後重新統一的開始，而實際上，且不說北宋的統一始終沒有完成，而在歷史中國的範圍內，遼、宋對峙，西夏、大理、吐蕃並存，如果將北宋看成統一，實際是將其他政權排除在中國之外。我將心中的困惑彙報於先師，他也頗有同感，但作為《中國歷史地圖集》主編的他，對《地圖集》中的某些不實之處卻無能為力。由於我隨侍先師的時間很多，有時連續幾個月住在外面，主要就是修訂《地圖集》、整理《肇域志》、編審《歷史大辭典》條目等，統一與分裂往往成為我們飯後、睡前的話題。

隨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倡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路線的貫徹和深入，史學界的前輩和同行也開始打破以往的禁區，特別是在口頭討論中，已經相當尖銳地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涉及不少敏感領域。1986 年我在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期間，北京大學的田餘慶教授在費正清中心作講座，在自由討論時，他也就統一分裂問題發表了見解，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87 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策劃一套面向大眾的中國政治叢書，我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將多年來的思考從「統一分裂與中國政治」的角度寫出來。到 1988 年暑假，這本小冊子已經寫得差不多了。8 月間去東北考察，從黑龍江黑河順黑龍江而下。航行在這條曾經是中國的內河、而今卻已是中國和前蘇聯界河的江中，迎面駛過的蘇聯客輪上人們熱情地招手，江邊卻依然可見一座座崗樓、燈塔、兵營，我在船艙中寫完了書稿的最後一段。

開學不久，學校發出通知，徵集「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週年理論討論會」論文，我將書稿的主要觀點寫成《統一分裂與中

國歷史》一文應徵。我的論文入選教育部的理論討論會，我去南開大學參加會議。這次會議組成評委評選出席全國理論討論會的論文，我的論文再次被選中。歷史學科評出兩篇論文，另一篇是北京大學羅榮渠教授的《論多元一線》。

當年 12 月，中共中央委託中宣部、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週年理論討論會」在北京大興召開。上海出席會議的代表有八人：復旦大學蔣學模（經濟）、顧國祥（管理）、葉易（文學）和我，上海社科院俞新天、李君如和陳鋒，還有一位寶山鋼鐵公司的代表。帶隊的是當時的新任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副部長劉吉是大會文件的主要起草人，同去的還有理論處處長吳修藝。這次會議的規格很高，開幕、閉幕式都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到會。會議結束時，不僅給每篇論文的作者頒發了蓋有中宣部、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大印的獎狀，還發獎金一千元，優秀論文（如羅榮渠的論文）發了兩千元，當時是前所未有的大獎。據說有的省市在會後又發了配套獎金。

改革開放是會議的主題，但爭論非常激烈，如對會議的文件之一——中央一份正在起草中的文件，有的認為不應再提「自由化」，有的則以為反自由化不力，還有各種意見，雙方或多方劍拔弩張，有時火藥味很濃。但討論集中於當前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民族等方面，歷史方面的論文僅有來自高校的這兩篇，社科院、黨校系統沒有選出歷史方面的論文。

1989 年初，上海市歷史學會召開年會，會後出版論文集，我將會上的發言整理成《再論統一分裂與中國歷史》一文發表，對前文作了補充。

等到那本題為《普天之下——統一分裂與中國政治》（以下簡稱《普天之下》）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時，在短期內印了兩次，一萬多冊很快供不應求。1989 年初，針對當時的實際情況，我將書稿中的

一節整理為《炎黃子孫不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代名詞》一文投給《光明日報》，於當年 8 月發表。

《普天之下》受到外界的重視。韓國某出版社全文翻譯出版，日本的刊物摘譯了大部分內容，美國的學者發表了意見，台灣地區出版的版本也在不久問世。第二年，三聯書店與台灣錦繡出版有聯合出版一百種「錦繡中華」叢書的計劃，向我約稿。我也覺得《普天之下》言猶未盡，再說因種種原因，出版社已不會重印，於是我以此書為基礎，擴充為《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一書。書稿完成後，我曾絞盡腦汁，想找出一個滿意的書名，但與《普天之下》比都相形見绌，不得已，只能用了這個相當直白的名字。

1992 年後，我就有關的歷史事件、人物寫了一些供知識界的同人閱讀的文章，發表在《讀書》、《書屋》等刊物。這些文章的着眼點只是歷史的一個片斷，但基本的觀點都是圍繞着統一與分裂這一主題，可以說是提供了若干實例，或者是作了具體的註釋。近年來因種種原因，寫得少了，但只要有可能，我還是打算寫下去。有的題目，如霍光，腹稿已打了好久，並曾答應交給當時在編《萬象》的陸灝兄，希望能快些問世。

1998 年底，當時供職於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劉景琳兄約我寫一篇比較全面反映我某方面學術觀點的文章，字數可達三萬，編輯保證不改。這吸引我寫出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統一分裂與中國歷史餘論》，發表於該社出版的《學說中國》一書。

三聯版的《統一與分裂》印了三次，此後未再出版。但好事者或好意的人早已將此書的全文或章節放在不同的網站，我還見過全文收錄這本書的盜版光盤。不過還是不時有人向我索書，其中有的讀者儘管已經在網站下載了全文，卻還希望有印刷出版的書本。我與三聯的出版合同早已期滿，而中華書局有意出版，所以就有了本書的增訂版。

考慮到這是對我在這方面研究的一次小結，我彙集了從《統一分裂與中國歷史》開始的幾篇論文放在附錄中，和《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一書一起出版。因為這些文章寫在不同的時間，又分別發表，所以難免有重複的地方，但為了保持原貌，增訂版中一律按原文，不作任何刪改。

寫完這篇自序時，我已過了六十週歲。從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到現在已有二十多年，從《普天之下》發表至今也已有十七年。其實我的很多看法，我的老師、前輩早已形成。我能夠發表這些文字，並且得以延續近二十年，衣食無憂，又不受干預，既說明探索的艱辛，也是一種幸運。如有可能，我願再探索二十年，願與同行和讀者共勉。

葛劍雄

2007年於復旦大學

2013年7月，此書版權轉交商務印書館，重印時除改正了若干明顯的錯字外，未作修改。

葛劍雄又記

目 錄

引言	001
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觀	
九州的傳說和現實	007
從未實行過的九州制 / 胎死腹中的五服制 / 大九州說 / 中原和華夏	
一廂情願的「天下」	013
九州觀念的延續 / 如果世上只有中文 / 長城的價值 / 炎黃子孫	
第二章 分與合	
歷史上的中國	025
國與「中國」/「中國」的擴大和變化 / 「中國」之爭 / 中國和中央帝國 /	
歷史上的中國	
分合大勢之一	034
從萬國到七國 / 六國滅四海一 / 由楚河漢界建起的西漢帝國 /	
盛世難再 / 大分裂的十六國和南北朝	
分合大勢之二	048
大唐帝國的形成 / 分裂和分裂的繼續 / 疆域空前的元帝國 /	
退縮中的明朝 / 統一疆域的最終形成 / 內亂外患國土淪喪	

第三章 分合的標準

何為統一.....	073
「統一」的本義 / 正統僭偽之爭 / 朝代的起訖與統一的始終 / 稱臣納貢與天下一統 / 漢唐典章與統一 / 赫赫武功與統一	
何為分裂.....	083
合中之分 / 分中之合 / 分中之分	

第四章 天命與人事

受命於「天」.....	091
得天獨厚 / 以農立國 / 運糧之難 / 鹽鐵會議上的難題 / 胡騎南下 / 農區的盈縮 / 周邊與中原	
有民斯有土	109
億兆斯民 / 移民實邊 / 「遷虜」與「謫戍」 / 自發移民與戰亂移民 / 內聚移民 / 移民和民族融合 / 遊牧民族的貢獻 / 人口壓力與邊疆開墾	
民以食為天	124
交通運輸 / 手工業和商業 / 地區發展的不平衡 / 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 / 分裂與分治的背後	
殊途同歸.....	136
中行說與漢使的辯論 / 各取所需 / 因時因地的行政管理 / 一般與特殊	
芸芸眾生與風流人物.....	149
「帝力」的變化 / 蒼生望太平 / 君王千秋業	

第五章 千秋功罪

社會財富的投向	169
「海龍王」的業績 / 太倉陳陳相困 / 馳道和宮殿陵寢 / 軍隊和佛寺 / 揮霍性的「賞賜」	
行政效率和治理	176
王溫舒的妙計 / 君民的不同選擇 / 張知縣砍茶樹 / 「崇禎二十四年」的黃冊 / 政策與對策 / 神通廣大的吏 / 禮失求諸野 / 朱元璋的「直隸」	
分裂政權的貢獻	192
小國的自立自強 / 移民與開發的導向 / 戍卒、流民、衣冠 / 從供天下到供本國 / 華夏正音重返中原 / 征服者被征服	
亂世豈止出英雄	207
飛將軍抱恨終身 / 百家爭鳴與萬馬齊喑 / 亂世的魅力	
結語	211
主要參考文獻	214
附錄一	
統一分裂與中國歷史	217
附錄二	
再論中國歷史上的統一和分裂	228
附錄三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統一分裂與中國歷史餘論	243

引言

在世界歷史上，中國並不是最古老的國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國也不是領土最大的國家，但是中國卻在世界史上擁有獨一無二的地位。

翻開世界史，我們可以發現，埃及人在公元前 4000 年前後就有了曆法，這時中國正是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時期。蘇美爾人在公元前 3500 年有了楔形文字的雛形，埃及人在此時有了最初的圖形文字，並在公元前 3200 年左右開始了第一王朝，腓尼基人在公元前 3200 年形成了城邦，第一烏爾王朝於公元前 3000 年在幼發拉底河入海處出現，基什王於公元前 2870 年裁定兩河流域兩邦間的疆界爭執並樹界石，埃及的第三王朝（公元前 2780—前 2680 年）開始建造金字塔，而中國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一般認為存在於公元前 2550 年前後。我們平時所說的「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指從黃帝時代以來這一歷史時期的一個約數，並不是正好有五千年。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圖上，早已找不到蘇美爾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國家，也不會發現第一烏爾王朝的蹤影。埃及作為國家的名字雖然還存在，但早已不是當年的主人了。從公元前 1680 年開始，西克索人、利比亞人、庫施人、亞述人、波斯人、馬其頓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先後成為這塊土地的主人，原來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眾多的外來人中，就連從公元前 3000 年起就長期使用的埃及語

也早成了消亡的語言。其他文明古國，如巴比倫、印度、羅馬等無不如此，而中國至遲在商代（商代以前的夏代的傳說是否確實，學術界尚無一致意見，姑且不論）已經建立了國家，時間大約在公元前 16 世紀。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起一個疆域遼闊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從此，儘管也出現過內亂、分裂、民族戰爭和改朝換代，但是以漢族（華夏族）為主體的多民族政權實體不僅始終存在，而且統一的疆域範圍越來越廣，最終凝聚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並在 18 世紀中葉形成了中國的極盛疆域。

原蘇聯的領土是 2240 萬平方公里，為中國領土的兩倍多，但是如果拿這個國家疆域變化的歷史與中國相比，那就與現實的數字完全不同了。10 世紀後半期，也就是相當於中國的北宋初年，東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輔羅斯興起，擴大了領土，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國家。但到 12 世紀中葉，羅斯就分裂為許多小公國，公元 1223 年又被蒙古軍隊佔有，成為金帳汗國的一部分，汗國通過俄羅斯王公進行統治。14 世紀以後，相當於中國元末明初時，莫斯科大公國逐漸強大起來，吞併了所有東斯拉夫人的土地，並擺脫了金帳汗國的統治，建立俄羅斯帝國。16 世紀後半期，俄羅斯的疆域擴大到伏爾加河地區。1667 年，吞併東烏克蘭和基輔的事實得到了波蘭的承認。1775 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區，1783 年奪取克里米亞。17 世紀俄國擴張到亞洲，18 世紀進入了遠東和中亞，19 世紀從中國攫取了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至於蘇聯的領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最終形成。

領土面積略超過中國的加拿大和僅次於中國的美國，它們的歷史都只有二百多年，而它們的領土定型的時間就更短了。

因此，在今天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幾個國家中，中國是唯一擁有歷史悠久的穩定疆域的國家。

回顧歷史，中國還有很多以同一性和延續性聞名於世界的紀錄：
漢族的前身華夏族，至遲在春秋時期（公元前 722—前 481 年）

已經成為中國的主幹民族，秦漢以後漢族作為中國的主幹民族一直持續到今天。即使在其他民族成為全國性的統治者時，這種狀況也沒有改變。

世襲的君主制可以追到傳說中的夏朝，商朝（約公元前 17 世紀—前 11 世紀）的制度更已得到考古發現的證實。自從秦始確定皇帝的稱號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沿用了兩千一百年。

以地球繞太陽一周為一年、以月球繞地球一周為一月的夏曆（農曆），雖然不時修訂，但一直使用了幾千年，至今仍在民間使用。自漢武帝開始以帝王年號為紀年的方法，比公元紀年早一百多年，一年不缺地排到宣統三年（1911 年）。

倉頡造字的傳說雖不一定可靠，已經發現的甲骨文卻證實了漢字至少已有了三千多年的歷史。早在春秋時期，漢字已經成為中原政權和華夏民族的共同文字。秦以後，隨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擴展，漢字的作用範圍越來越廣。漢字的基本體系從未發生變化，在楷書出現以後，字形也基本未再改變。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更多，足以說明我們擁有一項舉世無比的遺產——統一，歷史悠久的統一：統一的國家、統一的文字、統一的紀年、統一的……甚至統一的思想。這是一項多少人曾經為之奮鬥、為之犧牲、為之謳歌、為之自豪的偉大事業，也是現代中國人賴以安身立命並且不得不接受的遺產。

如果我們再深入地觀察一下歷史，還可以發現，在我們祖先的眼中，這樣的統一並不限於他們的國家、他們的民族，而是應該包容整個世界；之所以沒有做到，並不是不可能，而是沒有必要，因為在統一範圍之外的不是文明社會。這種觀念統治着我們這個國家和我們的人民長達兩千餘年，至今還存在於一些人的心靈深處，引起一些人的追憶，令一些人陶醉。

但是這樣的統一觀在另一些人的思想中早已發生動搖，尤其是在

西方列強用大炮轟開了大清帝國的大門以後，有人又進一步對我們這項遺產的價值提出了疑問。面對日新月異又風雲莫測的世界，有些人又感到這是祖宗留給我們的包袱，認為可以痛痛快快地扔掉。

這歷史悠久的統一，究竟是我們寶貴的遺產，還是我們必須卸去的包袱？都是，還是都不是？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做的恐怕應該是對歷史進行回顧——站在今天中華民族的共同的立場上實事求是地分析中國歷史上的統一、分裂和分治，全面認識它們對中國歷史的發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對今天的影響。

作為 21 世紀的中國人，我們無意尋求昔日的天下，無論如何這已經是歷史，但今天的中國是昔日的天下的產物，無論你視為遺產還是包袱，都不能不接受。

作為 21 世紀的中國人，我們必須放眼未來的天下，在 21 世紀的世界上佔有我們應有的地位。這就是我們再認識一下昔日的天下的目的——讓自己知道甚麼應繼承，甚麼該拋棄。

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觀



當地圓學說在晚清傳播時，輿情大嘩。不少飽學宿儒發出共同的責難：「要是地球真是圓的，生活在另一面的人難道都是倒立的嗎？」

雖然把「中國」確定為我們整個國家的名稱是到 19 世紀後期才出現的事情，但中國統一的概念卻已經存在了三千多年，甚至在中原的統一國家形成之前，政治家和學者已經紛紛推出了各自的統一藍圖。雖然當時還沒有一個君主真正能夠統治這片廣袤的土地，但「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頌歌卻在西周時就已經普遍流傳，並且被視為真理而接受。

不過，這首頌歌的作者（或許不止一個）大概不會想到，這種統一觀居然統治了中國兩千多年，並且到今天還沒有消除它的潛在影響。

九州的傳說和現實

在中國儒家的經典著作《尚書》中有一篇《禹貢》，一開始就寫道：「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思是說，在洪水橫流以後，大禹一面規劃治水，一面根據名山大川的分佈重新劃定區域，接着列出的九個單位是：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這就是九州。

在另一篇《舜典》中，又提到在堯、舜時，「肇十有二州」。「肇」是開始的意思。對這句話，西漢的學者谷永和東漢初的學者班固解釋為：在堯的時候遭到洪水，全國被大水分割為十二部分；但東漢末年的馬融的說法是：舜在大禹治水之後，從禹所劃分的九州中又分出幽州、并州和營州三個單位，因而總共有了十二個州，這一說法獲得後世多數學者的贊同。

從未實行過的九州制

由於這些記載都出於儒家經典，又得到後世眾多學者的肯定，所以從西漢以來就成為不可動搖的定論，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人們一般都認為，從大禹治水開始就有了九州這樣的政區，以後又演變為十二州。直到現在，一些人在敘述一個地方行政區劃的歷史時，往往還要從九州講起，似乎這是歷史事實。

由於全國就分為九州，所以九州又一直被當作全國、「天下」的代名詞。如南宋詩人陸游《示兒》詩中的名句「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就是取這樣的用意；晚清詩人龔自珍的「九州生氣恃風雷」一句也是如此。

五四運動以後，學者們向儒家經典提出了挑戰。經過反覆的爭論和研究，歷史學界已經把這傳統的九州說推翻了。原來《禹貢》中的記載並不是歷史事實，九州也不是中國最早的行政區劃。

《禹貢》雖然託名為大禹所作，其實卻是戰國後期人的作品。具體的證據很多，最主要的理由是《禹貢》中所記的不少地理狀況都是戰國時的現象，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戰國後期才出現，如果真是大禹所作，他豈能未卜先知？而且在《尚書》各篇中，《禹貢》的語言照理應比出現在它以後的《盤庚》（記錄商朝中期的君主盤庚遷都事）等篇難懂，事實恰恰相反，這只能說明《禹貢》問世的時間較晚。

《禹貢》所講的內容不符合歷史事實，至多只有傳說的價值。到目前為止的考古發掘和研究的成果，還只能證實商朝的歷史。近年來在河南等地發現的一些文化遺址，一些學者認為就是屬於夏朝。如果這一觀點得到進一步的證明和普遍的承認，那麼夏朝的主要統治區應該在今河南一帶，與文獻記載傳說中的夏都不超出今山西南部、山東西部和河南的範圍是一致的，而《禹貢》所敘述的九州的範圍，北至燕山山脈和渤海灣，南至南嶺一帶，西至隴東高原，至於具體涉及的

地理內容更廣，當然不可能是夏朝的事實。

現有的研究成果足以證明，不僅傳說中的大禹時代還不可能有甚麼行政區劃，就是商朝和更後的西周時代也還沒有出現行政區劃。既然《禹貢》是戰國後期的產物，那麼九州制是不是當時的制度呢？也不是。大家知道，到戰國後期，周天子的權力早已蕩然無存，而秦始皇還沒有統一六國，七個主要的諸侯國各自為政，又有誰有這樣的權威能制定並且實行包括各國的疆域在內的行政區劃呢？

可見，九州制只是當時學者對未來統一國家的一種規劃，反映了他們的一種政治理想。

秦始皇在全國推行了郡縣制，卻沒有在郡以上設立州。到了公元前 2 世紀末，也就是在《禹貢》問世的一二百年以後的西漢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漢武帝將全國除首都附近的七個郡級單位以外政區分屬於十三部，即豫州、兗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涼州、益州、荊州、揚州、交趾、朔方。每部設刺史一人，負責巡察境內的地方官和豪強地主，稱為十三刺史部，簡稱十三部或十三州，但那時的州還是一種監察區，而且這十一個以州命名的單位中沒有《禹貢》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而是增加了涼州、益州、并州和幽州。在公元 1 世紀後的東漢，州才成為最高一級的行政區域。朔方併入了并州，加上管轄首都一帶的司隸校尉部，總數仍為十三。由於交趾改稱交州，以州命名的單位就有了十二個，也不是九個。東漢末年曹操曾想按九州來重劃政區，卻沒有成功，從此再也沒有人作過這樣的嘗試。從這一角度講，九州從來沒有成為中國的現實。

胎死腹中的五服制

在《禹貢》中還記載了一種「五服」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根據這樣一種國家模

式，在王所居住的京城之外的土地應該分為五等，每一等四方各五百里。從京城往外，第一等是甸服（以農業為主的直接統治區），第二等是侯服（諸侯統治區），第三等是綏服（必須加以綏撫的地區），第四等是要服（邊遠地區），第五等是荒服（蠻荒地區）。

如果說，九州制因為是以名山大川為主要界限，所以還能使人相信為實際行政區域的話，五服制這樣四四方方二千五百里的劃分就難以自圓其說了。連宋代的儒家學者蔡沈在給《尚書》作註釋時也不得不指出：「堯的都城在冀州，冀州的北界在今河北北部和內蒙古南部，恐怕不會有二千五百里。即使算到這麼遠，也都是沙漠不毛之地了。而東南最富庶的地區反而被列入要服和荒服（離冀州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里），根據地勢來考察，簡直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¹

但是五服制中有一點卻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生產力低下、運輸相當困難的情況下，王（天子）對臣民的貢品的徵收不得不隨距離的遠近而改變。例如在天子直屬區「五百里甸服」的範圍內就規定了五種不同的納貢標準：一百里內割下來的作物連穗帶稈一起交，二百里內只交穀穗，三百里內交穀子，四百里內交粗米，五百里內交精米。實際實行的制度雖不可能如此刻板，但運輸能力顯然是必須考慮的因素。

九州制是對未來的設想，五服制卻是對過去的理想化。因為在西周和以前雖然採用過類似的分等級統治體制，卻並沒有把每一等級固定為五百里，實際上也不存在這樣的可能。所以五服制雖見於《禹貢》，卻從來沒有哪一個君主或政治家有意實行過，只能胎死腹中。

大九州說

正因為九州制僅僅是一種理想，所以在《禹貢》問世以後，還出現了另外幾種九州的方案，如《周禮》（也是託名周朝制度的著作）中

的《職方》、《爾雅》中的《釋地》和《呂氏春秋》中的《有始覽》都提出了自己的九州規劃，各州名稱與《禹貢》不盡相同，劃分的範圍也有所差異。

戰國時齊國學者鄒衍又提出了他的大九州學說，大意是這樣的（今譯）：

儒家所謂的中國，不過只有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國的名稱叫赤縣神州，內部有九個州，就是大禹劃定的，但這還不能算是真正的州。在中國之外像赤縣神州這樣的單位共有九個，這才是九州。在九州的周圍有大海包圍，人類和動物都無法來往。這樣的九州合起來又是一個州，像這樣的單位也有九個，在它們的周圍有更大的海洋包圍着，這就到了天地的邊緣了。²

這種學說與其說是對外部世界的了解，還不如說是出於臆想和推理。比起那種中國就等於天下，除了中國（實際上只是中原）之外就沒有文明社會的觀點來，大九州學說高明地承認還存在着不止一個同樣發達的人類社會。但恰恰在這一點上又作了實際上的自我否定：由於各州之間都由無邊無際的大海阻隔，人民禽獸是無法來往的。所以這種存在只具有理論和思辨上的意義，而不是對中國有影響的現實。

中原和華夏

無論是九州的設想，還是大九州學說，出現在戰國後期都不是偶然的。

《禹貢》所描述的地理範圍已經相當廣大，涉及今天中國內地的絕大部分。要具備這樣豐富的地理知識，活動範圍只限於黃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和西周人是辦不到的。而在戰國後期，秦、楚、齊、燕、

韓、趙、魏這七個主要諸侯國的疆域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範圍，在互相的交流中，各國的學者就可能掌握這些地理知識。《禹貢》中還記錄了各地的農業生產條件，如土壤的類型、土地的等級、水文狀況等，應納貢賦的等級和物產等，都是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準的反映。例如梁州的貢物中有鐵和鏤，鏤就是鋼。如果沒有冶金技術的進步，學者的想像力再豐富，也不可能把這種品種載入著作。

在七國的競爭中，儘管鹿死誰手還沒有最終明朗，但統一已是大勢所趨。秦國變得越來越強大，在錯綜複雜的形勢中明顯處於主導地位。一些有遠見的知識分子紛紛投向秦國，並為秦國戰勝其他六國，完成統一事業出謀劃策，也為統一後的未來規劃藍圖。多數研究者認為《禹貢》是秦國學者的作品，就考慮到這個因素。

在經過戰爭、吞併和融合之後，華夏族已經成為黃河流域乃至東亞大陸人數最多、經濟文化最發達、實力最強的民族，佔據了當時地理條件最優越的地區。而非華夏民族則被迫遷出了黃河流域，或者逐步融入了華夏族，或者接受了華夏文化並以華夏的一支自居。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陸附近的海洋上，還不存在在總體上能與之匹敵的其他民族和政權，而對此範圍之外的情況，雖然人們不至於一無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亞的陸上交通線和通向東南亞的海上交通線可能已經存在），但肯定相當有限。

然而隨着境外的玉石、珠寶、香料等珍奇異物的流入和親歷者見聞的傳播，以中原為中心的觀念不能不有所動搖。根據九州的理論，中原是文明的中心，九州是文明的範圍，但這些珍異並不產在九州，而是來自「非我族類」的夷狄之邦；莫非那裏存在着比中原更高的文明？國君、貴族和上層人士享用着來自境外的珍奇，卻從不承認會有文明程度超過自己的社會，於是西方的崑崙山、西王母、瑤池和東方的海上神山一類神話便合適地彌補了這一漏洞——原來在中國之外的確存在着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神靈世界。但這絲毫不會動搖中國的中

心地位，因為西王母儘管偉大，崑崙山儘管崇高，蓬萊島儘管奇妙，卻都屬於神仙的體系，而除了神仙之外，境外就只是一片愚昧落後的混沌世界。

可以認為：在戰國時期形成的統一觀，是以華夏族（漢族的前身）為主幹、以黃河中下游平原地區為中心的，是一種封閉的觀念。

一廂情願的「天下」

經過秦朝的短期統一和隨後的幾次戰亂，空前規模的西漢帝國終於鞏固下來了。到公元初，帝國的疆域西起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東至朝鮮半島北部，北起陰山、遼河，南至今越南中部，並在其中約上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上設置了一百零三個郡、國（一級政區）和一千五百多個縣、道、邑、侯國（二級政區），直接統治着六千萬人口。這一範圍比《禹貢》九州要大得多。

九州觀念的延續

漢人的足跡，根據明確的記載，已經達到了中亞、西亞，直到地中海之濱以及日本、東南亞、南亞，貿易交往的範圍就更大了。大一統的藍圖早已成為現實，而且「九州」之外的存在也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來自西域的葡萄、苜蓿、雜技、音樂，不像珠玉玩好那樣只是皇家的珍秘，異國的使者和商人在長安已不時可見。按照漢朝的兵役制度推測，絕大多數郡國都有人參加征伐匈奴、大宛的戰爭和在邊境的屯戍，也就是說各地都有人親身經歷「九州」之外的境地。出使異域歸來的使臣的詳細報告和管轄西域各國的都護府的文書檔案，使學者和史官能夠留下確切的記載。《史記》、《漢書》中有關西域的史料，

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還是比較翔實可靠的。

但是這一切並沒有削弱原來那種以中原為中心，華夏（漢族）為主幹的統一觀，反而還有所加強。因為通過這些活動，人們已經確信，在中國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國更強大、富饒、文明的國家了。其他國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對中國稱臣納貢、接受賞賜，就只能自外於華夏聲教，甘心為夷狄了。

東漢以後，西北以至中亞的民族大量內遷，東北民族也先後進入黃河流域，有的甚至成了中原的主人，但在佔優勢的華夏文化面前，這些軍事上的征服者無不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這些民族的首領也成了受命於天的「炎黃子孫」，甚至這些民族本身也漸漸融合在華夏（漢）族之中了。

發達的文字和造紙、印刷技術使中原統治者對邊疆地區和外國的一廂情願的記載長期流傳，而被記載的對象不是沒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無存，所以「二十四史」中某國於某年某月稱臣受封，某國於某年某月進貢來朝，某國於某年某月接受賞賜這類記載，在不少人的眼中自然成了中華帝國聲威所及的象徵。

這就毫不奇怪，為甚麼直到 18 世紀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發現，歐洲列強已在海上稱霸並將東方作為下一個目標時，修《明史》的史官在評述利瑪竇的《萬國全圖》時還認為「其說荒渺莫考」，只是由於「其國人充斥中土」，所以「其地固有之」——總算承認了歐洲的存在。這就是說，要是沒有那麼多西洋人出現在中國的話，即使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上畫得再清楚，史官們也會視而不見的。

這也就毫不奇怪，為甚麼直到 19 世紀後期，明明因敵不過洋人的堅船利炮，不得不簽訂屈辱的條約，以滿足列強的貪慾，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卻還要厚着臉皮寫上：「大清國大皇帝恩准該夷……」儼然一副作為世界主人的天朝皇帝派頭。而精通儒家經典的大臣和學者很自然地想到了春秋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的形勢，因而

當務之急還是要明辨「夷」、「夏」，但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至死也不知道這麼多的夷人是從哪裏來的，究竟要幹甚麼？一位關心時務、憂國憂民的大臣終於找到了對付夷人的絕妙辦法，他上書皇帝，建議大清國的軍隊以長竹竿為武器：因為他經過仔細觀察，發現夷人走路時腿腳是直的，關節難以彎曲，所以只要用長竹竿將他們撥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來，置之死地豈不易如反掌？

如果世上只有中文

清乾隆五十八年（公元 1793 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遣的使節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來華，經過一系列的談判，雙方終於就他覲見乾隆的禮儀達成協議，乾隆皇帝恩准在熱河避暑山莊萬樹園內召見。結果是乾隆「特頒敕諭」，讓他傳達給英國國王：

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賚表章……朕披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至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觀習教化，則天朝自有天朝禮法，與爾國各不相同；爾國所留之人，即能習學，爾國自有風俗制度，亦斷不能效法中國。即學會，亦屬無用。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無貴重。爾國王此次賚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製辦物件。³

這篇奇文在今天看來固然荒唐，但在當時卻是乾隆帝引為自豪的紀錄：「英夷」不遠萬里來效忠輸誠，遣使納貢，儘管不識大體提出不合

常規的要求，但經過「嚴加駁斥」，便恭順遵奉了。因此不僅由史官載入國史，還命邊臣將這道敕諭抄錄，以便遵照妥辦。所幸乾隆早死了幾十年，沒有親眼目睹以後英國國王用槍炮表示的「恭順」和愛新覺羅子孫用國土和主權所作的一次次「賞賜」。

要是世界上沒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西方文字，或者發生了甚麼天災將這些文字記錄的史料全部毀滅了，必定會有一批史學家根據上面這道敕諭和《清實錄》、《東華錄》等大清官方記載，考訂出 18 世紀末年英國向清朝「稱臣納貢」的事實，作為大清帝國的聲威已經越過歐亞大陸和英吉利海峽的證據。並且還可以進一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英國當時一定已內外交困，國勢衰弱，所以不得不尋求清朝的庇護，才不遠萬里來歸順輸誠。

這固然是近於兒戲的假設，但如果歷史上與中國的中原王朝發生過關係的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記載，又都保存到了今天，恐怕「二十四史」中的一些《四夷傳》、《外國傳》以及本紀、列傳中的某些篇章就得重寫了，某些史學家引經據典得出的高論也難免不成為上面這樣的笑話。

長城的價值

傳統的天下觀一方面把世界各國、各地都看作「王土」，但另一方面又把「天下」限制在中原王朝疆域的範圍，甚至只限於中原王朝的中心地區。在這種矛盾認識的支配和影響下，對僅僅作為部分中原王朝北方邊防的長城就作出了異乎尋常的高度評價。

今天的中國人不知道長城的大概絕少，但真正了解長城的卻並不多。

山海關有座孟姜女廟，據說孟姜女尋夫到此，哭倒了秦始皇築的長城。在北京北面的長城又有不少古跡同北宋的楊家將掛上了鉤。而

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的明長城往往被人糊裏糊塗地拉到秦始皇頭上。無數遊客會站在八達嶺上讚歎這「兩千年的奇跡」，其實這些都是民間藝人、文人雅士和胡編課本的冬烘先生們開的玩笑。

實際上，秦長城在山海關以北二三百公里，孟姜女在山海關不僅哭不倒長城，就連長城的影子都不會看到。北宋末年以前的軍隊最遠只到達今天北京市的南郊，像楊家將這樣的正規軍絕對不可能越過遼國的南京幽州城而活動在它的北面。山海關至嘉峪關間的長城築於明朝，與秦始皇毫不相干。八達嶺一段長城至多有五六百年的歷史，也不會找到兩千多年前的影子。

近年來，長城的價值又有了最現代化的標準，因為據說它是一位美國太空人在太空中唯一能用肉眼見到的地球上的建築物。最近又有消息說這一報道有誤，事實並非如此。其實，即使被太空人看到了，也不見得就抬高了長城的身價。因為今天的長城早已不是甚麼貫通萬里的建築了，很多地方已成斷垣殘壁，甚至已經杳無蹤影。殘留的長城中相當一部分只剩下黃土堆積，與周圍的荒野並無明顯區別。而地球上比長城明顯很多的建築物並不少，何至於它們卻沒有進入這位太空人的眼簾？要真有這樣的事，就只能歸結於一系列偶然因素：如這一段長城上空正好未被雲霧遮蓋，光線正好適宜，太空人正好在觀察，他事先又知道地球上長城。只要缺少其中一項，恐怕就不會有這樣的結果了。

如果這位太空人看到的不是長城，而是其他國家的甚麼建築，長城的價值是不是就會降低或被取消了呢？看來大可不必擔心。長城就是長城，它的價值客觀存在。

毫無疑問，長城是我國乃至人類建築史上的一項奇跡。我們的先民在極其貧乏的物質條件下，以最原始、最簡單的工具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顯示了他們的智慧、力量和決心。但是要把長城說成是中華民族共同的象徵，歌頌它在中國歷史上起過如何大的作用，就違背了歷史事實。

從戰國時的秦國、趙國、燕國開始到明朝末年修築的長城，歷來就是中原農耕民族對付北方遊牧民族的手段。且不說長城沿線埋下了多少屍骨，耗費了多少財產，就是以軍事上的作用而言，長城又何嘗達到了中原統治者當初的目的呢？實際上一旦中原王朝失去軍事實力，長城就形同虛設。秦始皇死後匈奴就越過長城佔了河套地區，明朝末年清軍出入長城如入無人之境，真正沿着長城作武力對峙的例子並不多見。

長城固然多少遏制了北方遊牧民族對南方的入侵和破壞，但同時也限制了民族間的交流和融合，固定了農牧業的界線。所以歷史上修築長城次數最多、工程量最大、質量最高的明朝，正是對西北和北方最保守、最無作為的王朝。隨着長城的最終完成，明朝的勢力再也沒有越出嘉峪關一步。相反，能夠把農業和牧業民族同時統一起來的政權就不需要、也絕不會修築長城。到了清朝，長城內外歸於一統，殘留的長城開始還作為地區間的關卡，以後就被完全廢棄了。這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頁。

秦朝人、漢朝人、明朝人的愛國主義自然只能以長城為界，因為長城外面就不是他們的國了，而是另一個政權或民族的疆域了。但唐朝人、清朝人的愛國主義就絕不會受到長城的限制，因為長城外邊同樣是他們的國。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的中國，在長城內外的各族人民早已融合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豈能再用歷史上部分中原王朝狹隘的民族立場來認識長城？豈能用它來象徵中華民族？

究竟是築起長城、守住長城對中國歷史貢獻大，還是將長城南北統一起來對中國歷史的貢獻大，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從漢朝以來把長城作為「天之所以限胡漢」（老天爺用來分隔胡人和漢人）的界線，把「天下」限於長城之內。流風餘韻，是否還存在於某些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深處？這是值得我們考慮的。

炎黃子孫

據說炎帝和黃帝是我們共同的兩位祖先，當然也是台灣地區、港澳地區以及世界上一切華人的共同祖先。近年來，「炎黃子孫」的使用頻率越來越高，範圍越來越廣，由文人學者擴大到社會各界，並進入了政府要人的談話和官方文件，大有取代「中華民族」或「中國人民」二詞的勢頭。這不能不引起稍有歷史常識的人的不安。

到目前為止，夏文化遺址雖然已見到發掘的報道，但還有待專家的鑑定和認可。比夏代更早的黃帝炎帝時代更找不到任何物證。根據現有的歷史知識分析，黃帝、炎帝只是當時眾多部落首領中的兩位，儘管他們是最強大的首領之一，但活動範圍和影響力還是有限的。一般說來，不可能超過以後的夏和商。即使從文字記載看，我們也只能把他們看作傳說人物。司馬遷寫《史記》時已經無法找到可靠的史料，只是採用了《春秋》、《國語》的成說。如果沒有新的史料或物證發現，我們大概不可能比司馬遷更高明吧！

根據《史記》的記載，我們這兩位老祖宗原來是一對冤家。炎帝本是天子，但實力衰退，統治不了諸侯，而黃帝卻文武並用，軟硬兼施，爭取到了諸侯的擁護。於是黃帝集中兵力，並動用了豺狼虎豹，與炎帝打了三仗，將他擊敗。炎帝倒也很識時務，甘拜下風，作了黃帝的屬臣，兩個部落也聯合了。以黃帝為首的炎黃聯合部落統治了黃河流域，繁衍了無數炎黃子孫。

但是從《史記》的記載看，當時也還有眾多的諸侯，他們顯然只是黃帝和炎帝的屬臣，而不是家族。莫非這些諸侯都絕了後？或者他們都遷出了中國？否則中國今天總有相當一部分人是他們的後代，而不是出自炎黃一系。

退一步說，即使早期的華夏族的成員都是炎黃的後代，史書上也還記錄了大量非華夏部族。這些部族有的被華夏族打敗了，被強制吸

收了，但並沒有被在肉體上消滅，同樣會生兒育女。考古發掘成果已經證明，全國數千處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可以分成多種類型。近年來在長江流域、燕山山脈、東北地區、四川盆地的考古發現進一步證明了中國早期文化的多元性。直到春秋時期，中原還有不少非華夏的部族，更不用說在中原以外地區。這些部族只有少數遷出了今天的中國，而大多數都逐漸融合在華夏族之中了。可以說，到秦始皇統一時，華夏族已經是民族大融合的產物了，其中純粹的炎黃子孫恐怕已經是少數了。

華夏族及以後的漢族在同化其他民族的過程中雖然也少不了武力的強制，但卻有一種積極的傳統，那就是並不過於重視血統關係。任何異族只要與漢族認同，接受漢族文化，就可以成為漢族的一員，而並不考慮他們的血統及是否曾與漢族婚配，對於異族的傑出人物，一旦能為漢族政權效勞，統治者同樣會委以重任，與任用漢族臣僚並無二致。所以雖然歷史上漢族同其他民族的衝突和戰爭也相當頻繁，但在漢族內部卻從來沒有發生過清查血統一類的運動。

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大多受到歧視和迫害，但來到中國的猶太人卻長期過着和平生活，得到漢人的平等對待，以至他們逐漸失去了保持本民族特徵的心態，終於在漢族中消失了。這就是一個很有力的例證。

從秦漢以來，由北方進入黃河流域的非華夏民族至少有匈奴、烏桓、鮮卑、羌、氐、羯、丁零、突厥、高麗、回紇、契丹、党項、女真、蒙古、維吾爾、回、滿等，其中有的來自遙遠的中亞和西亞。這些民族中，一部分又遷回了原地或遷到中國以外去了，但相當大一部分加入了漢族，有的整個民族都已經消失在漢人之中了。在南方，隨着漢人的南遷，原來人數眾多、種族繁雜的夷、蠻、越、巴、僰、僚、俚等，有的已經完全消失，有的後裔的居住區已大大縮小，原來他們的聚居區大多已成為漢人聚居區。南方的漢人事實上有相當大一部分

是他們的子孫。所以，在今天的十億漢人中，地道的炎黃子孫反而是「少數民族」。即使是漢人，如果只認炎帝、黃帝這兩位老祖宗的話，也有點對不起自己的親祖宗了。

何況今天的中國擁有五十六個民族，非漢族的五十五個民族中，像俄羅斯、塔吉克、烏茲別克等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同炎黃二帝拉上血統關係，難道他們也得稱為「炎黃子孫」嗎？在台灣和東南一些海島的先民中有馬來人的成分，豈能濫用炎黃子孫的概念？

世界上大概不存在絕對純血統的民族；如果有，也必定會退化以至消亡。華夏族由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發展到今天這樣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並非只是依靠了祖先的偉大或血統的優良，而是由於不斷大量吸收了其他民族，凝聚了各民族的精華。同樣，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來自組成她的各個民族，來自各民族自身的創造力和共同的凝聚力。

辛亥革命前後，革命黨的刊物和獨立各省一度使用黃帝紀年，這一方面是反對帝制的表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狹隘的民族情緒。就像革命黨人一度提過的「驅逐韃虜」、「種族革命」一類口號很快為「五族共和」的政綱所代替一樣，黃帝紀年很快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但幾千年形成的民族心理的變化，卻不像改變紀年那樣容易。中華民族共同的民族感情的形成和鞏固也還需要時間。但如果我們從傳統的天下觀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不把漢族的觀念和情感當作中國各民族的共性，在觀察歷史時不囿於傳統的中原王朝的範圍，那麼對「炎黃子孫」一類說法就能有科學的理性的認識。

註釋

- 1 蔡沈《書集傳》：「堯都冀州，冀之北境並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

- 2 《史記》卷 74《孟子荀卿列傳》：「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 3 1928 年故宮博物院編《掌故叢編》第 3 輯《英使馬戛爾尼來聘案》。